

抗战往事

1931

1945

经盛鸿

经姗姗

／ 著

局部抗战往事

全面抗战往事

抗战胜利往事

以多年的探访考查，挖掘鲜为人知的新史料；
以深刻的思想，揭示时代脉搏与事件底蕴；
以生动的文学语言，书写真实的历史；
以曲折的情节和密集的知识，表现那个时代的复杂与精彩；
以满腔的激情，赞颂爱国前辈。



团结出版社

抗战往事

经盛鸿
经姗姗
／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抗战往事 / 经盛鸿, 经姗姗著. — 北京: 团结出版社, 2016. 7

ISBN 978-7-5126-4300-0

I. ①抗… II. ①经… ②经… III. ①抗日战争—史料—中国 IV. ①K265.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70522 号

出 版: 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 100006)

电 话: (010) 65228880 65244790 (出版社)

(010) 65238766 85113874 65133603 (发行部)

(010) 65133603 (邮购)

网 址: <http://www.tjpress.com>

E-mail: zb65244790@vip.163.com

fx65133603@163.com (发行部邮购)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装: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170mm×240mm 1/16

印 张: 28

字 数: 500 千字

印 数: 4045

版 次: 2016 年 7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7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5126-4300-0

定 价: 49.00 元

(版权所属, 盗版必究)

目 录

CONTENTS

目
录

1

第一辑 局部抗战往事 / 1

1928年6月4日 皇姑屯日军炸死中国国家元首 / 1

1929年12月 南京《时事月报》刊登《田中奏折》的由来 / 15

1931年7月23日 上海北站刺杀宋子文的案中案

——日本制造侵华战争的导火索 / 26

1931年9月18日 “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 38

1931年10月 嫩江铁路桥畔抗战第一枪 / 58

“小小的‘满洲国’，大大的赵尚志” / 66

1932年1月 从“日本和尚事件”到“一·二八”战火 / 75

1932年4月29日 上海虹口公园爆炸案与韩国义士尹奉吉 / 81

1932年5月—1937年11月 韩国抗日组织在南京的秘密活动 / 87

1933年6月7日 北平六国饭店除奸特别行动 / 99

1933年10月10日 南京第五届“全运会”的救亡呼声 / 107

1934年12月18日 暗杀石友三，力阻“华北国” / 112

1935年5月4日 上海《新生》周刊“诽谤”日本天皇案 / 120

1935年11月1日 南京中央党部汪精卫遭记者枪击 / 123

第二辑 全面抗战往事 / 131

1937年7月7日 卢沟桥的枪声 / 131

- 1937年8月7日 确立中国全面抗战国策的国防联席会议 / 151
- 1937年8月13日 上海“八一三”抗战与“八百壮士” / 157
- 驾机撞击日机、日舰的中国空军勇士 / 168
- 南京行政院里的日本间谍 / 183
- 悲壮的南渡西迁——抗战期间全国高校内迁鸟瞰 / 201
- “吴中二老”共建抗日“老子军” / 211
- “一将无能，累死三军”——记南京保卫战中的唐生智 / 218
- 蒋介石对南京大屠杀的反应与举措 / 236
- 朝鲜“慰安妇”朴永心与南京利济巷“东云慰安所” / 244
- 苏联“空军志愿队”血洒中国长空 / 256
- 奇兵袭敌后——八路军挺进华北敌后 / 261
- “七七”事变后日本扶植的四个伪政权 / 269
- 曹锟、吴佩孚晚年拒当汉奸 / 284
- 1938年3月28日 华北头号大汉奸王克敏死里逃生 / 292
- 1938年4月7日 沪江大学校长饮弹上海南京路 / 296
- 1938年9月30日 “古董商”斧劈唐绍仪与蒋介石日记 / 300
- 1939年2月18日 伪维新政府外交部长陈篆上海遇刺记 / 312
- 1939年3月20日 越南河内高朗街刺杀汪精卫功亏一篑 / 321
- 1939年6月10日 南京日本总领事馆毒酒案 / 327
- 中国新闻界喋血上海滩 / 338
- 1939年11月23日 上海“高二分院”刑庭庭长郁华护法遇害 / 349
- 1939年12月12日 日伪毒弹击中抗日女志士茅丽瑛 / 353
- 1939年12月21日 “中统”美人计暗杀丁默邨 / 355
- 1939年12月24日 平安夜伪76号特工总部特务火并 / 362
- 1940年2月23日 胃里只有树皮、草根的抗联英雄杨靖宇 / 369
- 1940年8月13日 保镖弹中张啸林 / 377
- 1940年10月10日 伪上海市长傅筱庵血染市长楼 / 384
- 美国“飞虎队”威震敌胆 / 392
- 1943年3月 潘汉年误入南京“汪公馆” / 400
- 1943年9月9日 汪伪76号特工总部头目李士群死于日军毒饼 / 411

第三辑 抗战胜利往事 / 420

1945 年 9 月 9 日 南京黄埔路受降与励志社审判 / 420

1946 年 1 月 21 日 南京梅花山头炸汪坟 / 432

第一辑

局部抗战往事

1928年6月4日 皇姑屯日军炸死中国国家元首

（一）“皇姑屯事件”是日本对中国发动第二次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序幕

1937年7月7日，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前的中日往事，为什么要从1928年6月4日日本军人在沈阳皇姑屯阴谋炸毙张作霖的事件开讲呢？

这是因为：

在1946年5月3日，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对日本甲级战犯进行审判。国际检察局在撰写起诉书时，首先碰到的问题是，控诉这些日本甲级战犯的犯罪行为，从什么时间算起。国际检察局内部对此发生了严重的分歧与争论。一种观点认为，要从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算起；另一种观点认为，要从1937年7月7日日军制造卢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作为起点；还一种观点认为，要从1931年9月18日日军制造沈阳事变、占领中国东三省开始。

中国方面的检察官向哲浚经认真研究，向国际检察局郑重地提出了中国的看法：应以1928年6月4日日本军人阴谋炸毙张作霖的“皇姑屯事件”，作为控诉日本战犯的犯罪时间起点。这是因为张作霖是当时国际社会承认的中国国家元首、北京中华民国“安国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南京国民政府虽在1927年4月18日宣告成立，但还没有得到国际社会外交上的广泛承认。日本作为一个国家，施展阴谋炸死另一个国家的元首，这难道还不是国家间的战争行为吗？因此，“皇姑屯事件”是日本对中国蓄意发动侵略战争的开端与序幕！

向哲浚的主张占了上风，并最终为国际检察局所接受，1928年1月1日被正式确定为对日本战犯起诉的起始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书写道：

关于罪状的内容，可以概括如下：

第一项罪状：控告全体被告，在一九二八年一月一日至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这一期间，以领导者、组织者、教唆者或同谋者的资格，参与共同计划或阴谋，欲为日本取得对东亚、太平洋、印度洋以及其接壤各国或邻近岛屿上之军事、政治、经济的控制地位，为达到此目的，使日本单独或与其他国家合作，对任何一个或一个以上之反对此项目的的国家从事侵略战争。

第二项罪状：控告全体被告，在同上期间，参与共同计划或阴谋，欲为日本取得对中国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省（满洲）的整个控制地位，为达到此目的，使日本对中国从事侵略战争。

第三项罪状：控告全体被告，在同上期间，参与共同计划或阴谋，欲为日本取得对中国的整个控制地位，为达到此目的，使日本对华从事侵略战争。

.....

当然，“在一九二八年一月一日至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这一期间”，只是近代日本对中国第二次大规模的侵略战争。近代日本对中国的巧取豪夺与侵略战争早在19世纪中叶就开始了。

日本自1868年明治维新迅速崛起、走上军国主义道路以后，一直把对外扩张、攫取别国的领土、掠夺别国的资源与财富，以不断发展壮大自己，成为东亚乃至世界的霸主，“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作为国策与始终努力的目标。中国与朝鲜成为日本对外扩张与侵略的首选对象。日本政府专门秘密制定了有计划、分步骤地蚕食、入侵、分裂、瓜分与控制中国的所谓“大陆政策”。日本传统的武士道精神与不断滋长、迅速蔓延的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思想相结合，成为日本对华侵略的精神支柱；日本高速发展的近代经济与陆海军，是日本对华侵略的物质基础与战争工具；而日本自明治维新以降，近百年间一批接一批涌现出来的军国主义分子与右翼势力，则充当了日本侵华的急先锋与骨干力量；为军国

主义分子控制的日本最高军政当局则是日本侵华活动的指挥部。

早在 1874 年（清同治十三年），即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才数年，就对中国发动了第一次试探性的进攻——以琉球渔民遇难为借口，出兵台湾，对中国进行战争威胁与种种要挟，形成“台湾事件”。结果由于日本本国的经济力量与军事力量的不足，以及中国满清政府运用既备战、又求和的两手策略，使得日本政府仅获得了中国政府五十万两白银的赔款，以及占据琉球群岛，使之成为日本的冲绳县，此外就没有太大的收获。为此日本最高当局总结经验教训，认为只有迅速地、大力地增强日本的经济与军事力量，才能在对华侵略中具有强大的征服力量与威慑力量，迫使中国屈服，实现其对中国渗透、瓜分、侵占、控制的目的。

台湾事件后，日本当局积极扩充军备武力，经过了二十年的整军经武后，于 1894 年（清光绪二十年，中国农历甲午年）7 月，利用朝鲜东学党事件，对中国发动了处心积虑的第一次大规模侵略战争：从丰岛海战、大东沟海战，到平壤保卫战，日本凭借其迅速增强的陆、海军力量，迅速打败了腐败的清政府军队：北路日军从朝鲜跨过鸭绿江，攻入辽东，进逼长城，并在旅顺等地进行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南路日军在山东半岛登陆，在威海卫全歼北洋水师。日本当局宣称将从南、北两路夹攻清政府的首都北京。

在日本当局“勇猛进攻”的军事威胁与战争讹诈面前，以慈禧太后为核心的满清政府迅速屈服了。她们拒绝了康有为等爱国知识分子“拒和、迁都、备战”的主张，先后派出朝廷重臣邵友濂、张荫桓、李鸿章等赴日本求和，实际是乞降，历经种种屈辱，与日本签订了空前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日本以战胜者的姿态，对中国使节颐指气使，不仅从中国获得两亿两白银的巨额赔款，而且从中国割去了台湾（包括钓鱼岛）、澎湖列岛与辽东半岛（后经法、德、俄三国调停，以清政府增加赔款三千万两白银，才“赎”还“辽东”），控制了朝鲜，还获得了在中国开厂经商的资本输出的特权。这是日本军国主义当局对中国推行武力征服与战争恐怖威慑的侵略政策所取得的第一次成功，然而是一次巨大的成功。日本举国狂欢。日本当局更加迷信他们的对华武力征服与恐怖威慑政策，法西斯思想在日本迅猛发展。

果然，在《马关条约》签订五年以后，日本当局又派遣第 5 师团等部队，参与组成八国联军，一举攻占了中国的首都北京与天津、河北、东北等广大地区，迫使满清政府签订了更加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日本又一次获得了巨额赔款

与在北京、天津等地驻兵等更多的侵略特权。此后，日本随着其国力与军事力量的进一步增强，其对中国武力征服与战争威慑的侵略政策也一次接一次地付诸行动：1904年出兵中国东北，击败沙俄，从此控制了“南满”地区；1910年8月正式吞并朝鲜；1914年8月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机会，出兵霸占中国的胶东地区与胶济铁路达八年之久，并向袁世凯政府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1927年与1928年两次出兵济南，阻挠南京国民政府的军队北伐，残酷杀害中国外交人员与济南民众，迫使国民革命军屈辱地绕道前进，日陆军参谋本部与内阁陆军省共同拟定《对华方策》，狂妄地宣称：“显示皇军的武威，使全中国感到震骇……”

1928年6月4日，日本关东军以阴谋手段，炸死中国国家元首张作霖，企图乘乱夺取中国东北地区，揭开了日本军国主义第二次大规模侵华战争的序幕。

（二）“安国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在皇姑屯被炸身亡

1928年春、夏间，中国政局发生急剧的变化：南京的国民政府下令发动“第二次北伐”，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指挥所辖四个集团军的部队，蒋介石的第一集团军，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李宗仁的第四集团军，协同作战，很快击败奉军，打过黄河，逼近京、津地区。北京中华民国政府的最后一任首脑、“安国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眼看大势已去，不得不准备离开北京，撤往关外奉天老巢。



“安国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

张作霖本是亲日的大军阀，这次奉军在前线战败，他本想“借日本的武力留在关内”，但日方近来改变态度，借口防止战乱波及“满洲”，即东北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地区，多次逼迫张作霖退回东北。而且，日方乘张作霖窘困之际，向张提出“满蒙权益”的问题及让日本在东北修筑“满蒙五路”等问题。1928年5月17日，日本驻华公使芳泽亲自跑到安国军政府大元帅府——北京中南海怀仁堂，拜访张作霖，进行威胁讹诈。张作霖不愿

就范，说：“我们家中的事，不劳邻居费心！”断然加以拒绝。谈到最后，张作霖竟勃然大怒，由座上站起来，把手中的翡翠烟斗猛力摔到地上，对芳泽骂道：

“他妈拉巴子的，岂有此理！”说完之后，丢下芳泽，怒气冲冲离开客厅。1928年5月25日，张作霖又公开发表书面声明，反对日方5月18日提出的“警告”。事后，日方威胁张作霖，如果不听日方劝告，失败后想回东北，日方当解除其武装。

由于奉军连连战败，军心不稳，许多将领表示厌战甚至企图倒戈。东北军高级将领张学良、杨宇霆等见此情形，企图与南方国民革命军谈和，力劝张作霖早日回奉。

1928年5月30日，张作霖召集张作相、孙传芳、杨宇霆、张学良等人，举行最高级会议，决定下总退却令，率部撤离京津，退回关外。6月1日，他向北京外交团告别。6月2日，发表《出关通电》，声称他“本为救国而来，今救国志愿未偿，决不忍穷兵黩武。爰整饬所部退出京师”。在这同时，他令许兰州将“安国军大元帅”的印、旗以及国务院的印信、外交部的重要档案全部运往关外。

但这次张作霖毕竟是军败回奉，南方的国民革命军大军压境，再加上这时日、张关系紧张，因此张作霖的随身官员临行时都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有的人还私下准备了药品与饼干等物，以备不时之需。

在张作霖离京前夕，日使芳泽再次来找张纠缠，逼张正式履行日方帮助镇压郭松龄反奉时签订的《日张密约》。张作霖对日方这种趁火打劫的行为再次大发脾气，骂道：“日本人不够朋友，竟在人家危急的时候，掐脖子要好处……我不能出卖东北，以免后代骂我张作霖卖国贼。我什么也不怕，我这个臭皮囊早就不打算要了。”他拒不在芳泽带来的文件上签字。芳泽含恨而去。

在这时，张作霖接到奉天宪兵司令齐恩铭的密电，报告在奉天附近南满铁路（今吉林长春到大连的铁路）与京奉铁路（今北京到沈阳的铁路）的交叉点老道口、三洞桥、皇姑屯一带，日军戒严，不许行人通过，希望张作霖回奉时，加以戒备。当时，南满铁路由日本的“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和日本关东军管辖，京奉铁路由中国方面管辖。两条铁路在沈阳近郊皇姑屯车站附近的老道口、三洞桥一带地段，以立交桥交叉通过。但张作霖没有重视齐恩铭的密电，只是按惯例，由奉天省省长刘尚清向铁路沿线各县发出一个密电，通知“该管境内铁路桥梁，仰督饬军警，事先妥为警备，毋稍疏懈”。

张作霖为避开日军，曾一度想乘坐汽车取道古北口出关，但因怕公路坎坷不

平，汽车颠簸，身体受不了，仍决定乘火车离京。机警的张作霖曾“故布疑阵”，先宣布6月1日启程，后改为2日，但2日开出的火车是张作霖的五姨太寿夫人所乘，最后在6月3日，张作霖才离开北京。

6月3日夜间，张作霖出中南海西门，乘黄色的钢制防弹汽车出发，在严密警戒中开往火车站。车站月台上晃晃的灯光照射着卫兵的刺刀，充满着森严、沉闷的气氛。张学良、杨宇霆、孙传芳等前往送别。张作霖虽故作镇静、愉快，但当他回顾北京城时，眼里却闪着泪花。随张作霖上车的除大元帅府的人员与卫队外，有张作霖的第六夫人与三子张学曾，以及国务总理潘复和靳云鹏、何丰林、刘哲等军政大员与日籍顾问町野、仪我等。专车共有22节车厢，张作霖乘坐的包厢，是前清慈禧太后乘坐过的花车，车身宽阔，装饰华丽，据说是购自英国。包厢的前面是两辆蓝钢车，由军政大员与张作霖的随员们乘坐。这三节车厢位于这列22节长的火车的中央。在包厢的后面是饭车与乘载卫队的警备车。在专列的前面，则是一列压道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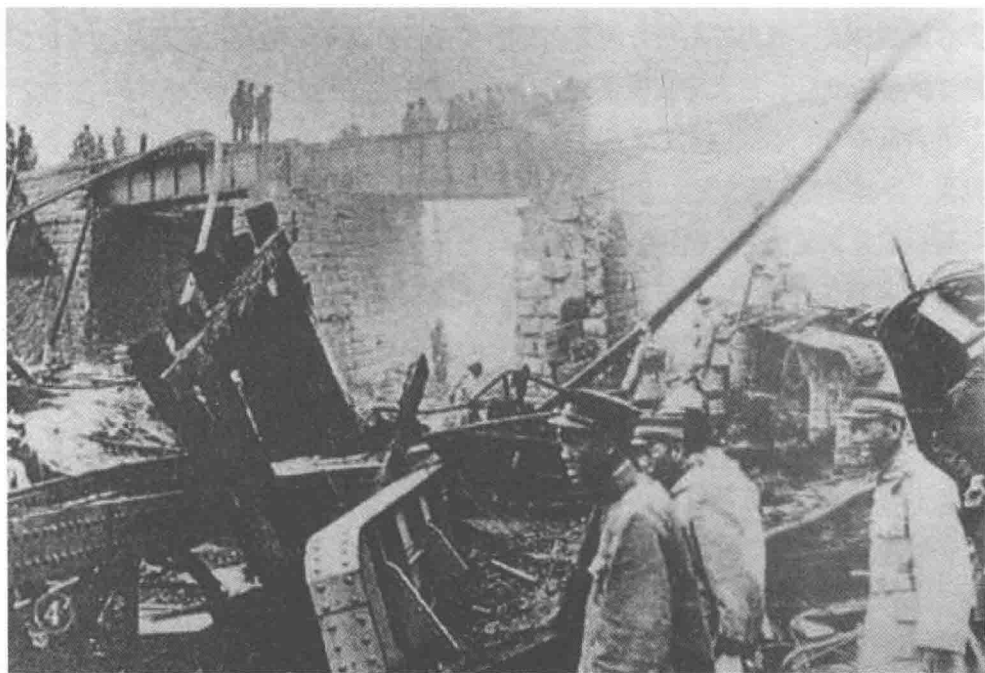
约在晚上9点钟，张作霖的专车从北京开出。在天津站，潘复、靳云鹏与日籍顾问町野下车。车到山海关，这里是日军驻兵所在地，车上人员不免紧张，但车站上只有一两名日军守备队站岗，态度如常。在奉天留守的黑龙江督军吴俊升特地赶到这里迎接张作霖，上了张作霖的专车。专车平安地开出山海关后，大家觉得放了心，都解衣而睡。

车到新民时，天已放亮。这里已经离沈阳很近，铁路两旁皆有奉军的步哨警戒，面向外立，作预备放姿式，十余步就是一岗。可是在京奉铁路与日本人管辖的南满铁路交叉点附近地段，就没有中国哨兵警戒了。

6月4日清晨5点左右，张作霖的专列在皇姑屯车站停了停，奉天宪兵司令齐恩铭来接，登上专车。专车继续向东行驶，准备到沈阳车站停靠。这时沈阳车站里已由上千名军警警戒，沈阳城里的军政大员和绅商代表也早已齐集于此，恭候专车的到来。

5点30分，列车驶进了京奉与南满两铁路交叉处的陆桥——三洞桥的桥洞。在这里，南满铁路线在桥上通过，京奉铁路线在桥下通过。沿京奉线开来的张作霖专车必须从桥洞内通过。就在张作霖乘坐的包车进入桥洞的一刹那间，预先安放在桥洞上的炸药爆炸了，随着震天动地的两声巨响，全桥塌下，张作霖乘坐的包车正当其冲，连砸带炸，全身粉碎，车身崩出三四丈远，只剩下两个车轮。吴

俊升与张作霖的六夫人当场被炸死，张作霖身受重伤，血流满身，气息奄奄。据后来英文《时事新报》报道，共有二十人被炸死，五十三人被炸伤。



爆炸发生后现场一片狼藉

正在奉天车站迎候张作霖的仪仗队闻讯赶来，变成救护队，抢救死伤者。宪兵司令齐恩铭慌忙从车上跳下，从附近拦来一辆结婚汽车，强将新娘赶出，急将张作霖架入车内，由副官王宪武抱着横卧车中，急驶回沈阳大帅府家中。慌作一团的张作霖家人用剪刀将其衣服剪开，发现一臂已断，随即找来医官施行紧急治疗。但终因伤重救治无效。张作霖临死前，对其卢夫人嘱托：“我受伤太重……恐怕不行啦！……叫小六子（张学良乳名）快回沈阳，好好干吧！”延至上午9时30分死去。

在民国初年中国政治舞台上活跃了二十年左右，雄踞东北并进而纵横关内，一度还担任了国家元首的奉系大军阀张作霖，就这样突然结束了他的一生，终年五十四岁。

（三）张作霖与日本当局复杂而微妙的关系

张作霖，字雨亭，辽宁海城人，1875年3月19日生。幼年家贫，仅入塾读书数年，就改学兽医，后流浪于辽东。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期间，他曾一度投军，接受军事训练。张作霖为人机警，在退伍后，结识东北各路绿林人物，拉杆子起家，不断壮大，成为雄踞一方的著名胡匪头目。1902年，他设法买通清廷大员，带部队投靠清廷，当上马队管带，后升任巡防营前路统领。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张作霖窥测时机，带部进驻沈阳，镇压革命党人。袁世凯窃权后，张实力扩张，被任为陆军第27师师长。他一面讨好袁世凯，一面投靠在东北势力日益扩张的日本军政当局，成为东北最有实力的军事人物。1916年袁世凯帝制自为时，为笼络张作霖，任张为盛武将军、督理奉天军务兼巡按使。张从此实现了攫取奉天军政大权的宿愿。以后，张作霖以其过人的胆识与手腕，在北洋军阀内部政治军事斗争中，投机取巧，不断扩充自己的实力，将其势力伸入黑龙江与吉林。北洋政府任命他为东三省巡阅使。张成为名副其实的东北王与奉系军阀首领。

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张作霖助直倒皖。战后奉系与直系共同把持北京政府，张作霖乘机扩张势力到察哈尔与热河。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奉系战败，张作霖回到关外，整军经武，联合皖系与南方的孙中山，结成“三角同盟”，同时秘密拉拢直系将领冯玉祥，于1924年9月发动第二次直奉战争，战胜直系。张作霖率奉军大举入关，把势力一直伸展到安徽、江苏与上海。1926年春，他又与吴佩孚弃嫌修好，共同击败冯玉祥国民军。奉系完全控制了北京中央政府，发展到极盛时期。

1926年6月，南方国民革命军与冯玉祥部开始北伐，先后击败吴佩孚与孙传芳部。这时北洋军阀中，只剩下张作霖，仍拥重兵三十多万。1926年12月，借十五省“推戴”名义，张作霖出任“安国军”总司令，出兵与北伐军对抗。1927年6月18日，张作霖又在北京成立“安国军政府”，张当上“陆海军大元帅”。这实际上是北洋军阀政府的最后一位国家元首。直到1928年6月奉军战败，北伐军进逼京、津时，他才不得不离京返奉。

张作霖与日本军国主义当局的关系是复杂而微妙的。张是靠日本的支持，才得以成为奉系大军阀、爬上东北王的宝座的；1925年底郭松龄倒戈反奉时，张作霖也是靠日军的支持，才得以击败郭军，保住他摇摇欲坠的统治；他能战胜直

系吴佩孚与冯玉祥部国民军，更是离不开日本的支持与帮助。因此，张作霖在与外国列强的关系中，基本上是个亲日派，曾与日本签订了许多公开的与秘密的条约，出卖东北与中国的权益给日本，并多次阻止与镇压民众的抗日运动。但是张作霖又和日本当局有矛盾。他不甘心做日本的傀儡，又害怕中国人民的指责，不敢当卖国贼。他甚至对一些已和日本签订过的密约，也采取抵赖、拖延与不合作的态度。特别是他到北京建立“安国军政府”、成为国家元首后，逐渐与英、美发生较密切的联系，对日本有所疏远，甚至对抗。从1927年到1928年上半年，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多次找张作霖，要他在出让满蒙新铺设铁路给日本的条约上签字，张作霖想方设法推托，不是在条约上只签个“阅”字，就是让芳泽去找地方政府协商，成了又一个解决不了的“悬案”。这一切都不能不使张作霖与一心想独霸东北的日本当局，特别是与关东军发生矛盾，不能不引起日本一些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的忌恨与仇视。

（四）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暗杀阴谋及其实施

日本军国主义早就有吞并与独霸中国东北的野心与计划。

日本明治维新后确立的国策，所谓大陆政策中，最重要的一环，就是吞并与独霸中国东北，作为侵略中国关内广大地区的前提和基础。早在1895年，日本挟甲午战胜之威，逼迫满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其中就有割让辽东半岛的内容。这是日本当局对东北野心的最早表露。但因俄、法、德的所谓“三国干涉还辽”，迫使日本将到嘴的辽东又吐出来。日本为此愤恨不已。直到1904年2月日俄战争爆发，1905年1月沙俄战败投降，日本才踏上了这片觊觎已久的黑土地，根据日俄签订的《朴茨茅斯和约》，从沙俄手里夺取了租借地关东州，包括旅顺军港，以及从长春到沈阳间的南满铁路和铁路两侧地带大片土地的治外法权，即满铁附属地。日本在关东州租借地设立关东都督府，建立满铁守备队，后来发展为关东军，在旅顺建立关东军司令部，常驻兵力为一个师团和几个独立守备大队；设立“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开办矿山、工厂、商店、旅馆，设立学校、医院、报社，加强移民，加强情报侦查和军事活动，把触角伸向四面八方，苦心经营二十余年，势力和影响越来越大，仅在东北各地设立的领事馆就有几十个。

日本为了进一步完全控制东北，在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和内蒙古东部地区建立一个独立的满蒙王国，成为日本的独占殖民地，曾想以张作霖作为这个满

蒙王国的代理人，通过张作霖来实现日本的野心与计划。为此，他们多年来给张作霖以各方面的支持，把张作霖扶上了“东北王”的宝座。但是，他们发现，张作霖越来越不听话；到1926年底1927年初，中国南方大革命兴起，北伐军势如破竹，日本当局看到张作霖的实力与威望都大大降低，就想采取“卸磨杀驴”的方针，抛弃张作霖，寻找和扶植一个新的代理人，或者就由日本直接出面统治东北。

1927年4月20日成立的田中义一内阁，在1927年6月、7月与8月，先后召开了“东方会议”与“大连会议”，讨论对华政策，特别是所谓满蒙问题。会上意见不一。极端狂妄强硬的日本右翼势力和少壮军人集团主张对中国东北采取强硬手段：一方面，乘张作霖困难之际，向张索取更多的“满蒙权益”；另一方面，在张作霖继续拒绝日方要求时，秘密布置对之实施暗杀，造成东北群龙无首、形势混乱的形势，乘机出兵占领整个东北。日本军部，特别是日本驻东北的关东军，是力主对东北强硬与暗杀张作霖的代表。他们认为，“为伸张日本的在满权益，必须使用武力，并认为与张作霖谈判也是无济于事的”。

在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在东京召开的“东方会议”上，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大佐，作为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中将的随员，列席了会议，并为武藤司令官执笔起草了发言稿。一年后，河本大作成为暗杀张作霖的元凶。

河本大作于1883年生于日本兵库县，是河本参二的次子，其家拥有大量土地和山林。1897年，他不顾其父反对，入大阪陆军地方幼年学校；1902年升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15期，1903年11月30日以第97名毕业；1904年2月12日授予步兵下士官军衔，从此开始了军事生涯。1904年他到中国东北参加日俄



河本大作

战争，这是他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1911年，他入陆军大学第26期，1913年升为陆军大尉，1914年以第24名从陆大毕业，任陆军某部中队长。1915年奉派往中国汉口，任日本陆军中支那派遣队司令部高级参谋辅佐；1916年任该司令部驻四川成都武官。1919年任参谋本部第一部（主管作战）及第四部（主管编纂战史）部员。1921年河本大作任日本驻中国北京公使馆武官。1923年8月6日调回日本，在参谋本部第二部任中国班班长，专事向中国派遣间谍，搜集政治、军事、经济情报等活动。1924年7月奉派到德国游学，1925年12月回国任步兵第14联队联队长。

河本大作养成了放荡与叛逆的性格，极其崇拜日本的军事谋略高手明石元二郎、青木宣纯，立志要成为明石、青木那样的人物，以阴谋和暗杀辅助武力，来实现日本的“大陆政策”。1919年末，他加入日本军人少壮派组织——“二叶会”，并成为主要成员。“二叶会”因在东京涩谷的一家名为二叶居的法国料理店成立而得名，有陆军士官学校第15期至第18期毕业的军官冈村宁次、矶谷廉介、多田骏、板垣征四郎、喜多诚一、石原莞尔、花谷正、桥本欣五郎等人参加，这些人后来都成为侵略中国的骨干人物。日本史学家岛田俊彦曾在《皇姑屯事件内幕》一文中这样评述河本大作：“河本大作出身富裕家庭，相貌魁伟，有点不像军人，年轻时就不愁钱用，玩得令陆军省人事当局特别注目；高兴时，还会教乡下艺妓唱唱小曲。在另一方面，河本的心底却野心勃勃，大肆批评陆军当局的软弱，对于讨厌者，他肆无忌惮地予以痛斥；脑筋又好。所以人事当局对他敬而远之。”

河本大作于1926年4月重返中国东北，在旅顺的关东军司令部任高级参谋；四个月后，1926年8月，晋升为陆军大佐。在任此职期间，他曾以“参谋旅行”名义，对东北地区共进行了五次军事、政治踏查，为日后武装侵占中国东北做准备。

河本大作重返中国东北时，正是张作霖与关东军闹僵时。张作霖以捉迷藏的方式，回避和拒绝日方提出的更多谋求东北地区“特殊”权益的种种要求，引起关东军和日本侨民日益强烈的不满。当时日本国内流传着“满蒙生命线论”。河本大作认为张作霖是日本所谓“满蒙生命线”的障碍。他后来在《我杀死了张作霖》的回忆录中这样发泄他对张作霖的不满：“得了势的张作霖慢慢的犯了老毛病。自入关进了北京，自封为大元帅的称号，因多年的愿望实现而踌躇满志。在日清战争、日俄战争中用将士鲜血换来的满洲，一切都在奉系军阀的支配下遭到蹂躏。忘恩负义的事不胜枚举。”

河本大作在1928年初便秘密部署谋杀张作霖。他说：“一切亲日的军阀，我们统统抓住。能利用的时候就援助，不能利用的时候就设法消灭。”1928年4月18日，他给挚友、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低他一届的矶谷廉介大佐的密信中，就直言不讳地透露了“干掉”张作霖的计划和决心：“若张作霖辈死一二人又有何妨，此次定要将他干掉，即使因此获咎革职，亦在所不惜。”

当得知张作霖即将败退撤回关外时，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召开秘密会议，商讨对策，决定乘机解除奉军武装，控制东北。这时，河本吼道：“杀掉张作霖，岂不是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了！”他的话语惊四座。河本继续说：“只要把这个头